

DOI: 10.6994/JET.202212_4(2).0001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与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Building the Malay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王淑慧*

Wong Shwu Huey

摘要: 对于“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与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的探索，必须立足于凌驾现实的层面，以涵括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思考维度，形塑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关切。与过往华文教育坚持的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传统视角不尽相同，在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视域下，除了民族本身的主体意识，尚需力求构建属于马来西亚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多元文化观，以谋得国家的和谐发展。再者，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思维并非意味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是迎合单一政策的发展，反之是为推进和提升因应大环境产生的不同文化凝结而成的共识和尊重多元或个别差异的文明价值观。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为何要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问题的提出并梳理其中的背景因素，进而论述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在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归纳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在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实践方向，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永续发展提供可参酌的思想导向。

关键词: 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多元文化，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This study that on "building the Malay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education" is an attempt to transcend the current discourse on Chinese education tha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mphasis on its past

* 王淑慧，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副教授。Email: shwuhuey.wong@newera.edu.my

or on its tussle with political pressures. It is recognised that education has a role to play in building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of the Malaysian nation and in fostering peace and harmony. Hence the idea of building a Malay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s the overall goal of education in general, and in which Chinese education may play its rightful role to promote and enhance cultural consensus and respect for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not on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Chinese education as a means to keep alive the herita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ut will instead examine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sustainability and its positive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keeping with the idea of a “united Malaysian nation” as spelt out in Vision 2020. The reasons for building the Malay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re examined,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laysian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relevance of sustainable Chinese education, it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mmunity,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practical approach, and how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Chinese education may provide valuable guidelines to help attain this ultimate goal.

Keywords: Malay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multiculturalism, Chinese education, sustainability

一 前言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后称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实然视角，和发展走向的应然思考。与原来的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传统视角不尽相同，在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视域下，华文教育除了民族本身的主体意识，尚力求构建属于马来西亚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共享理念，以谋得全民的和谐发展，让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是既能承传中华文化又能应接国际趋势深刻变动的可持续形态。

“华文教育”研究本身并非一个新的领域和概念，近现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从历史、政治、文化及发展趋势等，到各层阶华文学校的发展现状与困境、师资与生源、课程与教学等面向专题都有较为全面的探讨。毋庸置疑，在这些研究中，探索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

如何在因应全球化和大趋势发展中探索华文教育“传承与传播”、“承先与启后”的教育使命，这是检验华文教育持续发展的本质、实践和成效的时代量器。本文是华文教育研究中以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为视角，就“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进行思考，从探索“为何从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视角探析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华文教育的角色为何？”为起点，继而厘清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再通过梳理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在华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与实践方向，为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参酌的思想导向。

二 问题的提出

为何从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视角探析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华文教育扮演的角色为何？

在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视域下，华文教育从生存到可持续发展，进而追求存在价值和发展意义的进程，就不仅是华文教育发展的现实写照，更是华文教育走过历史，经历时代重要且必须的转变，这个转变显示了教育本身必须具备自我反省和反思的能力，才能获得持续前进的动力。

2.1 新经济政策：族群关系疏离趋向白热化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必要性，主要源自马来族群和非马来族群的问题。关于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国学者何西湖做了以下的梳理：“（1）华人人口比例较大，是新加坡以外华人人口比率最高的国家；（2）华人和马来人在宗教信仰上差别大，华人大多信仰大乘佛教，马来人则信奉伊斯兰教，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马来人和华人属于不同的文明群体，冲突的爆发在所难免；（3）华人在经济生活和居住区域上与马来人不同。大多数的马来人从事农业，居住在农村，而华人多从事工商业，绝大多数居住于城市。”（何西湖，2005，页42）其中影响至深的是第三项，因为贫富悬殊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导致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两大目标，于1970年至1990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历时20年。新经济政策又称“马来人优先政策”，是马来西亚政府制定和推行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目的就是开展协助马来族群摆脱贫困，在国家财富经济上的重新分配，以消除马来人和华人在经济实力上

的差距。通过国家财政政策、收入援助计划、干预商品市场、乡村发展计划、调整就业结构、修改资本占有结构，以培养更多马来民族资本家等途径的经济改革，确实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增长和发展的积极成效，缩小了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同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冲击了华人在经济方面的利益竞争、在教育方面的平等待遇，以及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权益。新经济政策虽然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成效，但阶级之间的鸿沟反而扩大了；马来资产阶级不仅控制了政权，通过新经济政策的社会重组，还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任那，2003，页167）。由此观之，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虽以经济为核心，但实质内涵和实施过程却远远不限于此，涉及了包含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等非经济领域的范畴。政策的执行虽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正向发展，但同时导致马来族群与非马来族群关系的疏远与分离，甚至走向对立。在此背景下，华文教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斗争”、“捍卫”等意识形态下发展。然而，华文教育不能只教育下一代人更深刻的体验分离与对立的关系，反之，应积极地构建新的族群关系，开拓新的教育格局。

2.2 2020年宏愿及2030年共享繁荣宏愿：构建国家共同体的蓝图

1991年，时任首相的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 YAB Dato'）在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成立大会上提出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作为马来西亚达致“先进国”的蓝图描绘。2020年的马来西亚将成为“一个精诚团结的国家，拥有一个充满自信、具有强烈道德伦理意识的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这社会是民主、自由、宽容、充满爱心、经济公正及平等、进步和繁荣的，并拥有稳健且具有竞争力、活力和弹性的经济。”（Mahathir, 1991, 页1-2）和新经济政策有近似之处，2020年宏愿所阐述的经济发展愿景，同时亦是国族构建的进程，“先进国”不仅仅是达致物质上宽裕，更以公民素养得以全面发展为目标。2020年宏愿的终极目的是关照全民命运，促进全民团结，对国家拥有归属感，一起生活在一个心灵自由，安全先进的大环境；对宗教和精神价值坚定不移，追求共同价值；各族群认同彼此是“命运以共”的共同体，共创自由、宽容、科学和进步的社会，建立共赢共享的现代化国家。虽然，马哈迪于2003年结束长达22年又107天的任期，2020年宏愿也随之“淡出”；但2018年5月马来西亚迎来了自

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党轮替，马哈迪再次掌权成为第七任的首相至2020年2月的政治风暴辞相为止的1年295天任期内，他重新检视2020年宏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2030年共享繁荣宏愿，他认为，落实近50年的新经济政策和2020年宏愿最终无法解决马来族群及非马来族群财富和收入不平衡的问题；这问题可导致各族群的紧张与焦虑，从而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国民团结的远景。因此，他表示必须采取新措施，让能证明族群有能力及符合资格的马来族群取得新的机会，因此营造“新马来人世代”的诞生，所谓“新马来人世代”须秉持诚信及廉洁的普世价值观及有富国强民的国民主义精神。马哈迪强调，不只从强化马来人经济的视角狭隘地看待2030年共享繁荣宏愿，实则是为了确保全国人民都能在2030年到小康的生活水平。在这理想的愿景里，衡量一个人的准绳是人格、是能力而非肤色和种族。纵然马哈迪已然无法落实其提出的宏愿，但2020年宏愿乃至2030年宏愿仍是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标杆，因为它们描绘“共享繁荣”的愿景符合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现实需求与期盼。

我们正处于巨大的历史变局中，要跟上时代剧变的步伐，让华文教育在未来仍可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跳脱以往的习以为常，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异动，它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谨守窠臼的思维可能蒙蔽了前进的视野，无助于华文教育认识、理解和贴近新时代巨轮滚动的轨迹。

三 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取向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为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指了一个现实可参酌的方向，同时描绘了未来的景象和实践的途径，惟需要立足于凌驾现实的层面，以涵括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新时代思维认识和理解“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与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的内涵与方向。

3.1 共同体与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在很小、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

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后本能的中立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上（王晓晴，2014，页114）。滕尼斯将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地缘以及精神共同体，其发展脉络应该是血缘共同体分离为地缘共同体，最后发展成为精神共同体（虞崇胜等，2016，页25）。共同体是指“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共同体不仅仅是指一群人，它是一个整体”。共同体意味着具有共同的善、伦理风尚、价值等，同时对于人类美德的养成、精神的归属具有特殊价值（马俊毅，2015，页14）。综上所述，共同体是由共同的地缘、血缘、精神、文化或利益等链接，将相关的组织、团体联系起来，形成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因此，共同体可被视为群体在共同思维和共同价值上集体追求的概念，一如“归属感”，都是构建多元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

中国继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再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乃因应全球化背景产生的一种处世理念，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程度日益深化，破除彼此间的限制和束缚，构建可以共享的发展成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已然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其本质理念是政治的平等共商，经济的互惠共赢，文化的多元包容，资源的共建共享。根据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的《东盟第二协约宣言》，东盟十国将于2020年成立“东盟共同体”，其中的三大支柱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2020年宏愿的提出既是以建立马来西亚的“国家共同体”为依归，以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构建国家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和导向。

表1 2020年宏愿呈现的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内涵

领域	内涵
政治	1. 共建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与目标的团结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不分地域与种族差异和睦共处，塑造一个忠于国家、肯于奉献的“马来西亚民族”。

	2. 育和发展一个成熟民主的社会，打造一个增进相互了解，面向社会大众的马来西亚民主模式，使之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经济	1. 确保一个经济公正的社会，国家财富将更加公平与合理地分配，且所有投身经济发展者将获享共同的果实。 2. 创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一个充满竞争、生气、活跃与强韧的经济体。
文化	1. 打造一个具备伦理与道德修养的社会，对宗教价值观与精神坚贞不移，并秉持最高道德观念。 2. 创建一个富有爱心的社会与关怀文化，重视社会大体更胜于个人利益，人民的福祉不在围绕于国家或个人，而是在一个强而柔韧的家庭体系。
思想	1. 创建一个自由解放、稳定与进步的马来西亚社会，国人拥有自力更生的自信心，对一切成就怀有优越感，并能够勇于面对任何困境。马来西亚社群将凭着自我努力赢取肯定，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潜能所在，不会轻易屈服，并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敬仰。 2. 创建一个开放与包容的社会，马来西亚各族能够自由奉行各自风俗习惯、文化与宗教信仰，并且对国家产生归属感。 3. 创建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一个具有创新和前瞻性的社群，不只成为科技的使用者，也是未来科技进步的贡献者。创建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一个具有创新和前瞻性的社群，不只成为科技的使用者，也是未来科技进步的贡献者。

资料来源：改编自文平强，2010；引维基百科译文。

综合以上的论述，本文认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内涵可归纳为，第一，多元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形成共享共荣的共同价值观；第二，在尊重差异和多元开放的基础上，各个族群相互包容、相互理解、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第三，国家政府通过宪法和制度的实践、社会建设、公民教育等在共同价值意识上凝聚各族群的共识。

3.2 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在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倍受关注。因此，有必要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共享理念，在华文教育体系与其他源流教育体系搭建共商、共享、及合作的共赢思维，厘清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以推进和提升华文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3.2.1 全球化视野

好的思想理念应能指引实践工作的开展，反之，行之有效的实践是依据思想理念而行。当前的华文教育正处于更深层思索可持续发展的岔口，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可成为引导实践变革的其中一项思想理念。其中，建塑全球化视野对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理念极为重要，有助于推进国家社会的集体成长。华文教育应该顺应国际趋势的发展，通过更紧密的国际交流互动，从中感悟、体认和学习，以对国家族群和文化有更深层的认知，对族群的现实发展和未来展望有更深的体认，促进各族群学生的相互了解，建树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确立为国家族群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

基于全球化的视野有助于华文教育再发回其社会功能的过程中，持续推动各族群的互信、相融、包容、合作，建构各族群是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其中一项重要的诉求为，淡化狭隘的单一民族思维，从维护全民共同利益和造就全民福祉的理想高度出发，摒弃非友则敌、非赢既输的旧思维，营建共赢共享的新思维，把华文教育和国家的整体发展作为后续发展的现实基础，立足于不同以往的更高层次，推动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当族群本身超越民族的自我利益和优越感，调整并转化传统斗争观念的枷锁，才能共建互惠多赢和面向未来的共同体，才能扬弃和跨越民族主义和政治偏差的现实藩篱。

3.2.2 跨文化交流

教育是促进不同文化传播、交流、融合与共享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国民团结及民族和谐发展的基石。在文化、宗教、价值等方面皆呈多元、多样形态的马来西亚，有必要进行深度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才能达致各民族之间的异中求同、尊重包容、多元互鉴和共存共荣。唯有更深层的交往与互动，才能使各民族意识到多元政治权力的角力、多元经济权益的竞争、多元文化内涵的绽放、多元教育形式的共存都是当下国家社会发展的基调和样态。因此，华文教育和其他源流教育都是增进马来西亚各族群相互理解的纽带和桥梁，是推动国民进步和发展、实现国民融合和包容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教育将各民族文化差异转化为理解和协作的力量，并非要构建统一或只有本土意识的单一族群文化，而是提倡一个求同存异、尊重差

异、包容互鉴、共存共荣的共生共赢模式，使各民族能在和合交流中更进一步地相互认识，进而携手推动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

对于族群之间的差异，从现实层面出发，发挥教育的功能，引导学习者掌握兼容并蓄、择善从之，尊重大环境的多元性，使多元化的国家社会在交流与对话中跨越民族之间的隔阂、冲突和优越感，构建和睦共处、多彩丰富、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特色。简而言之，在维护和坚持中华文化的同时，华文教育必须同时抓紧学习者的思想工作，裨益他们更了解马来西亚的现实发展，使他们成为促进国民团结和文化传播的传承者、维护者和推动者。通过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增进年轻一代对国家、族群的认同与理解，养成他们多元开放、尊重包容、和平共享的正向心态，形塑华文教育未来的新格局。

3.2.3 开拓新格局

“新格局直接取决于新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科学规律的总结，对新型国际关系和21世纪全球人权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启发意义。”（赵明霞，2018，页11）中国的崛起，为全球华人带来深远的影响，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是现实的体现，由此衍生的许多新思想和新理念，更可为全球华人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框架的借鉴，为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教育事业厘清前进的方向。循此思路，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思想和理念应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促进各族群的共商合作、共赢共享的趋势，同时是对现实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思，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不为营造恶性竞争，不是强弱拉锯，更不应视之为“同化”的手段，事实上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是通过建设性的交流与对话，协调与合作，理性地处理分歧，以开拓共建共享集体利益的新格局。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新时代，华文教育体系中的1301所华文小学、62所华文独立中学、81所国民型中学和3所华人民办高校，在维护母语教育，为国家社会培育人才之际，应避免陷入狭隘单一的民族主义漩涡，须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抵御族群之间因文化差异的偏见、摩擦与碰撞，开拓更多元交流与对话的渠道，积淀更多的理解与包容，从而推进华文教育发展的新方向，以顺应国际、国家社会的发展趋势。

四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在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实践方向

“可持续发展”从社会发展视角是指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李蕾等，2005，页36）。而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反思其未来的发展。华文教育向来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惟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承继先贤教育遗产的同时亦应合时代及国家发展需求培养现代社会新人”和“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华文教育发展及研究亟待思考的核心问题。前者思考的核心是“价值”，如何结合现实和大趋势，因势利导培养适用于新时代造福国家社会的人才，体现出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多元化背景下的存在价值；后者探索的是“意义”，如何在在坚持维系固有特质特色的同时，能持续地立足多元背景的马来西亚，然后放眼国际，呈现华文教育能与时俱进的发展意义。同时，在此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背景下，由于各族群共同价值与主体价值存在裂隙、多元文化与族群文化之间的拉锯以及国民认同与民族认同等问题的存在，对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造成不可避免的挑战。

4.1 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马来族群和非马来族群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认知差距是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现实挑战，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4.1.1 共同价值与主体价值的裂隙

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构建必须以各族群之间的共同价值为基石。这基石的搭建，在国家稳定发展时期相对容易达成，然而马来西亚自结束英国殖民统治独立迄今60余年，族群情绪常受政治操纵，族群之间对抗的基本体现为“挑衅”和“防卫”（文平强，2010，页611-613）。马来族群和非马来族群或为了维护和坚持本身的权益，而拒绝或抗拒与其他族群共享同等的待遇。再者，当前马来西亚处于政治转型、政局诡异的复杂情境，不可避免的引发因不同族群、不同政治立场在不同价值观的裂隙，导致主体价值的再放大化。简而言之，政治转型再度加深族群关系的失衡，进而引发各族群价值观的混乱，对构成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在共同价值的建设与维护上的挑战。

共同价值是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建设过程不可或缺的粘合剂。族群与族群之间共享国家发展的历史，培养共享共荣、尊重包容的共同意识，共建融合了各族群的马来西亚。然而，执行多年的族群本位政策，深化了族群的主体价值，影响共同价值的构建，加之各族群保守分子对其他族群的负面诠释，往往抵消各种建立良好族群关系的努力。政治操纵和政策偏颇引发的族群问题，就是造成共同价值和主体价值裂隙的关键。马来西亚必须完成与政治体制改革及政治文明发展相应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的再建设，以形塑新的共同价值。但要从现有的政治形态和体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触发各个族群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议题，从而导致与族群主体价值的冲突，形成族群对于共同价值建设的紧张与焦虑，是教育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现实挑战。

4.1.2 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忧思

文化是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重要载体，马来西亚的文化是融合了马来族群和非马来族群（包括华族、印度族及其他原民族）文化特色的多元文化，国家共同体所依托的文化不是基于人口多寡的族群文化的构成，而是各个族群经历长时间的历史洪流融会贯通、各族群之间已经普遍接受的共同的多元文化内容。虽然，多元化理论容易陷入另一种极端，即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它坚持所有文化都具有相等的价值，这并能客观反映不同文化的发展状况；它以孤立、封闭的视角看待不同的民族维护群体，忽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更新（贺金瑞等，2008，页8）。惟马来西亚自16世纪始至20世纪中叶先后为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殖民统治，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加上国民组成族群的多元，遂成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与此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族群对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意义感，甚而引发对本族地位和文化认同的危机感。

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即是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嬗变和融合了多元文化的本土华人文化。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生存发展过程中积淀并渗透于华人族群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一脉相承，在代间流动，且极具生命力的族群软实力。华人文化不仅记载了华人和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发生和演化过程，更是马来西亚华人世代相传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行为规准，牢牢地渗透在大部分华人的血脉

中，制约着大部分华人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简而言之，华人传统文化是华人将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真实存在的展现（王淑慧，2018，页10）。因此，族群文化的传承，成了华文教育不可逾越或摒弃的精神准绳。既要体现国家弘扬和推广的多元化，使得共有的文化成为多元族群在尊重包容的环境和机制中共享共融，又要发扬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特色，深化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底蕴，为民族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两者之间的拿捏与平衡，已然成为华文教育的忧思与拉锯，造成维系共同文化轴心价值的散乱。

4.1.3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双认

身份认同是一种基于“自我”和“他人”区分基础上，社会成员或者群体通过对于“自我”特征的确证，来明确自身的群体性归属和特征的认知过程。身份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是一种被他人和自我共同构建出来的符号系统，由个体或者群体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互动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并非人或群体内生的因素，因而是可以被同化和改变的一种柔性的价值认知和自我定位（傅才武等，2016，页70）。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对族群的历史经历与文化发展倾向性的共识与认可；国家认同则是国民对于国家的国家主权、信仰理念、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认同，是一种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凝聚民心的重要联接。由此观之，国认同必须高于民族认同，意即民族认同不应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

在马来西亚，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并存的，因为每一个国民都有所属的族群，在国家体制里，各个族群又都属于国家的（王淑慧，2020，页41）。就此前提出发，民族认同在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认同可以是民族认同的一项保障，国民在传承族群价值与文化的同时，亦以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为最终的归宿。如何促进国民的国家与民族双重认同，而非停留在民族认同的层面，提升国家认同意识，是华文教育需要突破的其中一道枷锁。

4.2 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在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向

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多元教育体系中的一种常态，被视为中华文化传承与承传的堡垒，但同时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因素的深切考验。因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拓展华文教育未来的教育前景。

4.2.1 “共享”理念

推进马来西亚全民共同体并非放弃民族本身的主体意识，或者为国家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建立划一、统一的标准，而是构建一个尊重差异、多元共存，维护民族本身特色又兼具国家多元特质的共同体。其中，“共享”理念的建设有助于化解因文化差异引发的刻板印象与矛盾，而“共享”的基础理念则是构成优秀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成分的“和合文化”。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出现“和”、“合”二字。《尚书》提出“九族既睦，平理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概念。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礼仪。百官族姓明理彰义，就能实现天下和谐。“和合”二字联用，构成一个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上岂能和合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春秋战国不少思想家都阐述了“合和”的理念，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管子将“和”与“合”并举，《管子·幼官》记载“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墨子以为“离散不能相和合”，提倡“兼爱”、“和合”、“非攻”、“尚同”以实现“一同天下之义”（陈立旭，2018，页84-85）。“合和”的内涵诠释了对不同事物差异性的接纳与包容，说明了不同事物彼此得建构和谐关系才能生成或造就大环境的平和。

华文教育在思考可持续发展之际也需要做到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体利益的有机结合。考虑国家多元族群的文化差异、华文教育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包袱意识的影响，在教育理念、办学管理、培养模式等方面，在国际教育趋势、国家教育蓝图都有可借鉴、仿效和移植的参考依据，都离不开国际与本土、集体与个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以及因地制宜的变革与创新。以“和合文化”作为“共享”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搭建“共享”的平台，在这平台上认识和辩证以世界发展趋势和国家根本利益为导向，展现华文教育的国际性和维护华文教育的主体性。因此，华文教育为了全民共存、全民发展和全民福祉，应倡导相互合作、休戚与共的“共享”理念，因为“共享”能增进全民共进与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从教育的本质构建和谐族群关系。

4.2.2 “理解”教育

顺应时代进展的步伐，构建全民共同体的意识，让华文教育未来的发展能因为多元包容而绽放异彩，因为多元借鉴而丰富多彩，通过教育实践，促进多元族群的互动与交流，提高华文教育在国家发展的影响力和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华文教育因此需要更多愿意变革创新与交流借鉴的开放性思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教育，建构全民的共识：（1）认识与接纳，构建国家共同体需要对不同族群有更多的认识，才能增进彼此的理解，才能实现尊重差异、接纳多元和消弭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2）交流与互鉴，多元的环境造就文化差异，难免引发族群之间的误解，因此交流能力显得必要且重要，以增进理解，化解分歧，建设和而不同，包容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多元化社会；（3）合作与共享，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全民合作、相互扶持、同舟共济，才能建设多元开放的繁荣环境。从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相互理解是推进跨族群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理解越深入，则越有利于各族群共同价值的构建，越有利于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理解”不仅仅是从“生存”的意义探视之，更要从未来和可持续的意义层面把握之。言下之意，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不只着眼于当下，更指向未来。

完善华文教育对多元族群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拓展华文教育对不同源流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改善华文教育不同于以往给予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展现文化自信和竞争力的同时，注入更多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让不同的族群更认识华文教育、理解华文教育，进而认同华文教育。从国家发展的视角，落实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族群共处问题的个体反思，更是对国家社会及华文教育未来发展的集体利益的探索。因此，通过教育推进文化包容，培养师生探究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更多元渠道的跨族群交流合作机制，充分展现华文教育的文化与教育自信。这是“理解”教育的深层价值导向。一言以蔽之，通过“理解”教育在原有的华文教育平台，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促进全民的合作与发展，构建共同的多元价值观。

4.2.3 公民意识

“公民”在现代思想体系中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政治概念、也是法律和文化概念。当下的“公民”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定位，“但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这种概念和相关的做法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化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正在促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的身份认同和动员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页57）。应运而生的是“全球公民”的概念，因此需要培养公民的国际责任意识，开展公民的全球公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以实现全球的集体利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前提下，做好国家公民的公民意识教育显然是需要被优先考虑的。“公民意识的基本特质为主体性、公共性和精神性。主体性即公民身份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公民利益意识、公民平等意识；公共性即公民责任意识、公民参与意识、公民行动意识、公民契约意识；精神性即公共精神，比如负责任的爱国精神”（彭小兰，2013，页12-14）。公民意识的建构中，既涉及国家的集体认同，同时涵括族群的个体认同，两者的关系是交融的。族群里的个体，既属于族群本身，同时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对族群本身的文化认同之际，对国家的国民身份认同应给予同等的认知。由此延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对国家社会的集体发展应在“公民意识”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对于华文教育在华文教学过程中涉及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问题，中国社会语言学者郭熙有精辟的分析。

表2 汉语教学分类表

教学类型		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华文教学	中文教学
		汉语民族群	非汉语民族群	华侨	华人	非华外国人
性质、环境、目标						
母语教学		+	-	+	+	-
第一语言		+	-	+/-	+/-	-
教学目标	国家认同	+	+	+	-	-
	中华民族认同	+	+	+	+	-
	中华文化认同	+	+	+	+	-
技能目标	交际工具	+	+	+	+	+

资料来源：郭熙，2015，页477。

华文教育在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时，在内容方面应关注三个方面的平衡，同时应积极落实：（1）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认同他人，履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2）个体对国家、社会和社区的责任意识，实践对社会社区的服务行动；（3）建树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全民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唯有着力加强公民意识的建设，才能扎牢和维系马来西亚全民共同体的纽带，臻至全民共赢共享的理想状态。

处于高速发展的当下，华文教育应在原有传承中华文化、为国家发展培育人才的立基点上，搭建共享合作的桥梁、推广促进和谐的理解教育、深化公民意识，为国家、社会及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更美好的路向。

五 结语

中国的崛起，为全球华人带来深远的影响，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是现实的体现，由此衍生的许多新思想和新理念，更可为全球华人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不一样的思想框架和借鉴，为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教育事业厘清前进的方向。为走过两个世纪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供了未来发展的前导理念，同时赋予华文教育新的时代使命。华文教育有必要明晰两个立足点，首先要坚持国家与民族认同的有机结合；再者，扩展华文教育的多元开放，既能彰显民族文化特质，又展现多元包容的自信。与此同时，思考和完成两个方面的价值转向：一是从“冲突与对抗”转向“共生与共存”，各族群必须携手挣脱因新经济政策而产生的负面枷锁，通过构建“共享”理念和“理解”教育，解构造成族群“冲突与对抗”的困局，形塑“共生与共存”的格局；二是避“单一文化观”落实“多元文化观”，每一个族群都有本身的存在价值，偏执于“单一文化观”，将导致其他族群的愤懑与怨怼，建树“多元文化观”有助于增进彼此的认识与了解，唯有摒弃“单一文化观”的狭隘，才能共创“多元文化观”的多彩。在此前提下，需要深化两个方面的思考：首先，当下的华文教育是具备构建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现实条件，同时处于构建国家共同体的必要时期，因此华文教育必须更现实地看待和关注未来的存在价值和

发展意义。其次，华文教育强化国家共同体的思维不只是族群本身单向共同体的构建，更是马来西亚多元化背景的真实要求，是全民共生共存的发展指向，是全民共赢共享的前进目标，是从单一族群思维走向全民共建为共同体的发展进程。马来西亚国家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其时代意义，是通过教育体系构建和维系全民的共同需求，因此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思维和现实可实践的智慧来应对国内的问题，建树因应和解决问题的新思维，为华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定向坐标，以培育能适应未来的新时代公民。

参考文献

- 陈立旭（2018）和合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浙江社会科学》，2，83-92。
- 傅才武，严星柔（2016）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63-74。
- 郭熙（2015）论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中国语文》，5，475-478。
- 贺金瑞，燕继荣（2008）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12。
- 何西湖（2005）影响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几个因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42-43。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李蕾，胡友静（2005）论教育中的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探索》，6，35-36。
- MAHATHIR Mohamad, YAB Dato' Seri（1991）. *Malaysia: The Way Forward*.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Research & Services, Malaysian Business Council.
- 马俊毅（2015）论多元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及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3-22。
- 彭小兰（2013）公民意识教育如何可能，《思想政治课教学》，9，12-14。
- 任娜（2003）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与阶级分野，《东南学术》，5，162-167。
- 王淑慧（2018）华人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大学生生命教育探析，《教师教育学报》，3，10-15。
- 王淑慧（2020）调整与转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对华文教育的作用，《中国知识网络China Knowledge Network》，16，37-58。

- 王晓晴（2014）对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理解，《市场周刊》，2，114-116。
- 文平强（2010）《马来西亚何去何从，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构建：从独立前到独立五十年》（下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虞崇胜，余扬（2016）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背景下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7，25-29。
- 赵明霞（201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南方论刊》，6，10-39。